



新起点丛书

真实与虚幻之间

人性与灵魂的一次大冲撞，在真实与虚幻之间，我与宇宙零接触，当我们进入恐怖的世界中，拿到这个色的所罗门魔瓶，突然火中的房子烧了神秘的大脑，于战斗中的动物开始拯救燃烧中的黑客。

心 / 编

决战大自然系列



远方出版社

新起点丛书·决战大自然系列

真实与虚幻之间

兰心 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月霞

封面设计:白云

新起点丛书·决战大自然系列
真实与虚幻之间

编 著 者 兰 心
出 版 社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州大中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00 千
印 数 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988—9/G·349
总 定 价 1320.00 元
本册定价 15.6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目 录

-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1)
- 治疗方式 (18)
- 车库中的飞龙 (38)
- 鉴别谎言的艺术 (61)
- 对现实的迷狂 (83)
- 反科学 (116)
- 牛顿之眠 (142)
- 当科学家认识到罪恶 (159)
- 怀疑主义与好奇心的联姻 (171)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希望得到刺激的需求,甚至在具有很高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当他们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心理体验告诉别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怕将这些体验讲给那些智能高的人时不能得到听者的精神生活有同样经历的肯定或回应,因而会受到他们的怀疑或嘲笑。一个诚实的游客看见类似海蛇的怪物,并不害怕提起它。但是他有某种奇异的不祥之兆、刺激、奇思怪想、幻觉(所谓的)、梦或其它心理意念,他就会犹豫、彷徨,不愿承认。我觉得人们之所以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事情太捉摸不定。

如今,讲述这种体验仍会受到多数人的嗤笑和嘲笑。但人们较易克服隐瞒心理——比如,在治疗师和催眠师的“诱导”下。不幸的是——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像和记忆常被混淆。

有些“被绑架者”说,他们不用催眠也可以回忆起那种经历,而很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催眠并不是唤起回忆的可靠办法。除了真实情况外,催眠术常常诱发想像、幻觉和



虚构,使得病人和医生都不能将真实和幻觉二者区分开来。催眠术似乎具有很强的暗示作用。法律禁止把催眠术作为法庭证据或调查犯罪的手段。美国医学协会认为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并不比不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可靠。一本标准医学教科书(哈罗拉尔·L·卡普兰的《精神病学综合教程》,1989年版)警告说:“催眠师的信念将与求医者产生交流并溶入到求医者所认为的记忆中,这样做很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求医者坚信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因此,进入催眠状态的人所讲述的被外星人绑架的说法中可信成分极少。这样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被施用催眠术的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急于取悦于催眠师,他们有时对催眠师不经意的巧妙暗示做出了顺应式的反应。

加州大学长岛分校的阿尔文·劳森做了一项实验,在筛除 UFO 迷以后,挑选出 8 个人,然后先由医生催眠,告知他们被外星人绑架,带到一艘宇宙飞船上,并受到检查。在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们描述自己的体验。证明他们极易受到诱导,叙述的内容同那些自称被绑架的人的叙述几乎没什么区别。的确,劳森对实验对象做了简单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况下,处理外星人绑架病案的治疗学家都会按惯例诱导,有些诱导很详尽,有些则比较委婉。

正如劳伦斯·怀特所说,精神病学家乔治·加纳维曾对一个处在催眠状态下很容易受到诱导的病人提示说,某一天中有五个小时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当他说到她的头上



有一盏明亮的灯时，她立刻告诉他见到了 UFO 和外星人。他坚持说她被外星人做过试验，于是一个详细的遭绑架的故事便产生了。但当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看到那段录像时，她承认，她像是经历了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梦中的感觉。然而，在第二年的时间里，她仍经常回想那个梦中的情景。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未被施用催眠术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并没看到的東西。在一个典型实验中，他让接受实验者看了一个关于车祸的电影。在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他们会草率地作出错误的回答。比如说，尽管在影片中并没有红灯出现，但实验人员仍不经意地提到红灯。于是，许多接受实验的人都恭敬地回忆说看见了红灯。当谎话被拆穿时，有些人愤怒地提出抗议，强调说他们非常清晰地记得看到过红灯。看电影的时间和给他们的错误信息的时间越长，记忆改变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样在商场走失的虚假的记忆——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一旦提起有关的主要内容，病人经常振振有辞地大讲这个事件的有关细节。很少一点提示和问题，特别是在治疗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地诱导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错误的回忆。记忆能够





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错误的记忆甚至会在对其毫不怀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况下被植入人的头脑之中。

康奈尔大学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们的同事发现,学前的孩子对于别人的暗示特别敏感,对此他们并不惊讶。当孩子第一次被问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夹住过,他正确地否认了,但后来他又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次事件的自己编造的细节。当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时发生的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这些输入的记忆。观看孩子录像带的专家无法更好地分辨出他们所说的哪些是错误的记忆,哪些是正确的记忆。有什么理由认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错误呢?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一个二战时期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我们大家。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个情节。当我九岁时看这个影片时,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像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



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

这些事情涉及到对广告和国家宣传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评价。但在这方面,国家宣传倒认为根本就没有外星人绑架的事情——尽管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事件出现后一般都会在今后数年时间内有跟踪报道——治疗专家必须非常谨慎,他们不会意外地接受或选择他们从某人身上诱导出的故事。

也许实际上我们记住的只是一系列记忆的碎片,然后按我们自己设计的结构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组合十分巧妙,那么,我们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易于回忆的容易记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没有组合起来的话,检索会难一些。这种情况很像科学的方法——很多离散的数据点可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记载。总结和解释。这样我们更容易回忆起理论而不是那些数据。

科学领域中,理论总是不断地重新评估并接受新的数据。如果这些事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超过了误差允许的范围——理论可能就不得不进行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遇到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又产生出新事实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几乎不会受到挑战。但是,记忆





会凝固在某个地方,不论这个记忆中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或经过不断的艺术化修改而成为一件作品。

被证明是最好的幽灵的是那些远多于神和魔鬼的圣者,特别是从中世纪晚期到当代的西欧国家的圣母玛丽亚。然而,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带有强烈得多的世俗气息。魔鬼的影像,对 UFO 的神话的洞察力也可以从被描述得很神圣的幻想中产生出来。也许最有名的有法国的让娜·德阿卡、瑞典的圣布里其和意大利的吉罗拉莫·萨丰纳罗拉。但更符合我们话题的幽灵是牧羊人、农夫和孩子们看到的那种幽灵。在这个被不确定的事情和恐慌困扰的世界中,人们渴望与上帝取得联系。关于在卡斯迪利亚和加泰罗尼亚(均为西班牙城市——译注)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详细情况在威廉·A·科里斯迪安在他的著作《中世纪后期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幽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年)中有详细记载:

在一个典型的事件中,一个农妇和孩子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女孩或一个身材极其矮小的女人——大约只有三英尺或四英尺高——自称是圣母玛丽亚,是上帝的母亲。她要求心怀敬畏的目击者去找村子的德高望重的男子或当地教堂的权威人士,要求他们为死者祈祷,或遵守上帝的戒律,或就在郊外他们见面的这个地方建一座圣坛。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比如瘟疫。但是,当瘟疫流行时,如果满足了玛丽亚的要求,她许诺治愈疾病。



目击者竭尽全力按她所说的去做。但当她告诉她的父亲、丈夫和神父时，他们要她不要向任何人再提起这件事。他们认为这只是妇人愚蠢的或轻浮之举，也可能是魔鬼给她造成的幻觉。于是她三缄其口。几天以后，她再次遇到了玛丽亚，玛丽亚因为她的命令没有被遵照执行而有些生气。

“他们不会相信我”，她抱怨说，“给我一些能够证明此事的象征性的东西吧。”她需要证据。

玛丽亚，虽然事先没想到需要提供证据，现在还是提供了象征性的东西。村民和牧师们很快就相信了。圣坛建了起来。附近地区的疾病不可思议地都治愈了。朝圣者从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赶来。牧师们忙了起来。这个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最初的目击者被任命为圣坛的守护者。

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由城市首脑和名流组成的调查团负责证实幽灵真的存在，尽管最初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怀疑过。而事实证明要求的标准并不高。有一次，一个八岁男孩在因瘟疫而死的前两天所说的胡言乱语被冷静地接受了。有些调查团在事件发生几十年甚至100年后还在讨论它。

在《真实的与虚假的幻觉的区别》一书中，这方面的一位专家，叫做让·德·热尔松，他在大约1400年时，总结了目击者所提供的见到幽灵的可信程度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和宗教统治者是否愿意接受建议。这样，任何看到



破坏当权者权力的幻觉的都被视为“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他们就是不可靠的证人。圣灵和圣母也会被迫按当权者的意愿说话。

那些据称是玛丽亚提供的“象征性的东西”,被认为是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中包括一支普通的蜡烛、一块丝绸和一块磁石、一片彩瓦、脚印、证人以异常快的速度采集到的藓、一个插在地上的简单的木十字架、证人身上的鞭痕和伤口、一个12岁女孩把她的手扭成令人惊讶的形状和将腿向后折叠等多种扭曲形状,以及闭上嘴即暂时变哑。所有这一切在她所说的事情被接受的那一刻便都“治”好了。

有时候,提供证据前,目击者的说法被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例如,一个小镇上的许多目击者都说前天晚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可以说是高个子的女人,穿着素白,抱着一个婴儿,在她的周围有光环笼罩着,光亮将整个街道照亮。而在其他时候,站在目击者身边的人们却什么也没看见,就像1617年在卡斯迪利亚出现的幽灵的报告中所记载的目击者的记录所描述的:

“啊,圣巴多罗买,那个这些天来见我的女人,她穿过了草地,跪倒在地,抱住那个十字架——看啊,看她!”尽管那个年轻人努力去看,但他只看到几只小鸟在十字架周围飞翔。

编造和承认这类传说的可能的动机并不难找:为牧师、公证人、木匠、商人等人在经济萧条时期寻找就业机会以推



动地方经济；目击者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提高；为葬在墓地的亲属进行的祈祷因后来的瘟疫、旱灾和战争而取消；鼓动公众情绪以打击敌人，特别是摩尔人；提高对教会法令的屈服和遵从的程度；确认对宗教的虔诚程度。到圣地进行朝圣的人的狂热令人叹为观止。朝圣者将从岩石上刮下来的石屑或坛上的尘土掺水当做药喝下是很普通的现象。但我认为大多数目击者并不是编造整个事件就此罢手。他们继续编造其他事件。

圣母玛丽亚所提出的绝大多数紧急要求都具有平淡乏味的特点。例如，在 1483 年加泰罗尼亚出现幽灵的记录报告这样写道：

我命令你的灵魂去命令堪普马里奥的厄尔·陶恩、米莱拉、厄尔·萨冷以及桑特·米科尔等教区的人的灵魂去命令牧师的灵魂，让人们在 30 天内交付什一税和教会所有的税赋，对他们暗示地或公开占有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归还给合法的所有者。这些必须做到，在主日检查。

另外，他们必须停止亵渎神祇，他们应该按他们死去的祖先的教诲乐善布施。

目击者常常在梦醒以后看到幽灵。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在 1523 年作证时说，她是在“不知道是否是由感觉支配”的情况下下床来的，但在后来的证词中她又说自己是完全清醒的（这是允许的按不同层次回答问题的方式：完全清醒、打盹、昏睡、沉睡）。有时细节被完全忽略，比如



和她当时在一起的天使是什么样子；她描述的圣母玛丽亚有时高有时矮，有时是母亲有时是小孩——这些特点本身显然表明是梦中才出现的东西。在赫斯特巴赫的恺撒利奥在大约 1223 年所写的《关于奇迹的对话》一书中，圣母玛丽亚神圣的幻影经常出现在晨祷中，而晨祷的时间正是人们沉睡的午夜时分。

怀疑很多、也可能是所有的这些幽灵是梦中的形象是十分自然的。这些东西出现在醒着或睡着的状态中，同时伴随出现的有编造的瞎话（制造骗局。现在正在兴起编造奇迹的热门工作：根据偶发事件或神的旨意创作宗教油画和形象）。有关事件载入大约在 1248 年由阿方索十世（智者）指示出版的教会法规和民事法律的手抄本《七法全书》。从中我们可以读到：

有些人编造假话说在田野或城镇发现了圣坛，或自己修建圣坛，他们说在那些地方有圣人的遗物，并且胡说这些遗物会创造奇迹。于是，人们被劝诱从各地到这些地方朝拜，以便从那里能够得到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些人受梦或虚幻的空想的影响，建立圣坛，然后编造谎言说这些圣坛是在上述地方发现的。

在列举错误信仰形成的原因时，阿方索从宗教教派、人的看法、幻想，以及梦和幻觉中总结出了一致的结论。他对一种名叫 antoiancia 的幻想作出了这样的定义：

Antoiancia 是一种出现于人的面前，然后又消失的东



西,人会在昏睡状态中看到它或听到它,因此它是一种没有实物形态的东西。

一个1517年的教皇诏书将“梦中出现的或上帝派来的”的幽灵进行了区分。显然,无论是世俗的和宗教的机构,即使是在轻信盛行的年代,对骗局和错觉也都是十分警惕的。

尽管如此,在中世纪时代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里,这种幽灵仍受到罗马天主教教士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因为圣母玛丽亚的训诫符合全体神职人员的需要。极不充分的一点作为证据的“象征性的东西”——一块石头、一个脚印儿及任何可以伪造的东西——这就够了。但在15世纪初,大约在新教改革时期,教会的态度改变了。那些宣称与上帝交流有独立渠道的人摆脱了必须遵照上帝旨意行事的教会的束缚。其他一些幽灵——比如贞德——具有一些令人感到不舒服的政治或道德的含义。1431年审判贞德的宗教法官这样描述她所象征的冒险精神:

使她受到巨大危险的威胁是来自于这种人,他们固执地相信他们见到了这种幽灵并拥有上帝给他们的启示,因此他们就编造上帝所说的话,捏造并非出自上帝之口的虚假的预言和预示。另外还有种族的诱惑、新教派的分立和其它大量的对上帝的不敬的行为使教会和天主教徒变得道德败坏。

贞德和吉罗拉莫·萨丰纳罗拉因为自己所具有的洞察





力而被火刑处死。

1516年第五次拉特兰会议使“使徒的席位”保留了检查幽灵真实性的权利。对其幻觉没有政治含义的农民的惩罚接近最残酷的程度。看到了圣母玛丽亚幽灵的年轻的母亲，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被一位名叫利森西亚多·马里安娜的宗教法庭法官形容为“损害了我们圣洁的天主教信仰，损害了其权威性”。她见到幽灵这件事“没有任何价值并且是无聊的举动”。“按理说，我们应该对她更严厉些”。宗教法官接着说：

出于对让我们缓和酷刑的某种原因的敬意，作为对弗朗西斯卡·拉·布拉瓦的惩罚和企图做类似事情的人的警告，我们宣判她剥光上衣，骑上毛驴，穿过贝尔蒙特的主要街道并当众鞭打100下，在厄尔·昆塔纳镇用同样的方法惩罚。从今以后她不能再以公开或秘密的形式直接地或旁敲侧击地宣传她在忏悔中所说的话，否则她将作为不信奉我们圣洁的天主教信仰的冥顽不化之人而被起诉。

尽管处罚如此严厉，但仍然经常有坚持步其后尘者，全然不顾那些迫使她坦白自己说谎、做梦或是在迷惑的状态下的胡说所使用的“手段”，坚持说自己的的确确看到了幻影，这可真让人感到惊讶不已。

在报纸、广播和电视出现之前，几乎人人都是文盲的时代里，为什么宗教偶像的幻觉在细节上如此相似？威廉·科里斯迪安认为，在宗教戏剧（特别是圣诞节戏剧）、牧师



和朝圣者的游历和教会训诫中就存在着一个现成的答案。与附近圣坛有关的传说传播很快。有时人们从百里以外或更远的地方赶来,说他们生病的孩子能用圣母踏过的鹅卵石治愈。传说又对幽灵的传说产生了影响,反之亦然。在干旱、瘟疫和战争频繁的年代,普通人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和医疗服务,也没听说过科学的方法,因此,很少会对传说产生怀疑。

为什么这些告诫如此现实?为什么在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需要像圣母这样有名的幽灵显现,才能有神坛修造出来,也才能从灾害中拯救人们?一些重要和具有预见性的信息在其后的数十年时间内其重要性才被确认,并且认为这些信息只能是上帝或圣人发出的?这是否极大地促进了天主教与新教、启蒙运动之间进行的殊死斗争事业?但是至今我们也没有遇到幽灵显现,警告天主教不要接受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的错觉,或警告不要同纳粹德国结盟——这是两个具有重大的道德和历史性重要意义的事件,在这两个问题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已经难能可贵地承认教会犯了错误。

没有一个圣者谴责对“巫婆”和“异教徒”所进行的严刑拷打、实施火刑处死。为什么?他们难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邪恶吗?为什么圣母玛利亚总是要命令可怜的农夫将其旨意转告给当权者?为什么她不亲自去告诫当权者、国王或教皇?在19世纪和20